

编者按:2011年9月24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迎来七十周年华诞。以“外交家摇篮”著称的北外重视公共外交的研究与实践,去年曾专门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以践行“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办学理念。为庆祝北外七十华诞,北外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推出《从这里走向世界》(“北外公共外交文化论丛”第一辑),该文集收录了北外学者近年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主题的系列文章。本刊特刊发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陈雨露教授和该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知名学者张中载教授为该书所作的序言。

从这里走向世界

陈雨露

2010年8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从这里走向世界》(“北外公共外交文化论丛”第一辑)是“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部出版物。

作为一种外交实践,公共外交历史悠久;作为一种理论概念,它出现在1965年。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公共外交走向兴盛。随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的终止,各国政府和智库对国家实力的关注重心从单纯的军事硬实力转向文化、经济软实力。学者在理论层面上对此多有论述。20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公开宣称,在后现代,决定谁掌控权力的不是物质生产,而是形象和信生产。他们为世界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信息时代的新技术、新媒体在技术上对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简易、快捷、高效率的手段,并授予公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和公共事务参与权。

“公共”(public)一词日益广泛、频繁的使用见证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进程。

在古希腊城邦中,人生活在两个领域:私人领域,即奴隶制下的主宰与服从;公共领域,即自由民的平等交往。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已见“公共”雏形。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始于哲学家的批判精神,成于民众参与的公共精神。18世纪欧洲“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发达标志着市民在国内公共事务中的参与。个体和群体通过报刊杂

志、政治俱乐部、文化文学沙龙、公共集会、咖啡馆、小酒店等渠道表达他们的政见和诉求,公开参与塑造政治舆论,并以此影响国家权力机构的内外政策。“公共舆论”从此诞生。

当今的公共外交体现了民众参与国际事务的社会性和普遍参与性。公共外交的兴起催生了国际外交领域的新博弈。

2006年,美国成立非政府组织“公民外交联盟”。2011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报告称,中国公共外交能力已经超过美国,例证之一是中国在美国建立的孔子学院已多达七十多所,远远超过美国在中国开设的开放图书馆。报告流露出一种不安的情绪。英国正加大对“英国(对外)文化协会”的投入,累计已投入数百亿英镑,其中最多的年度投入超过20亿英镑。2010年,法国政府决定加强民间组织“法语联盟”在全球的运作,打算在130个国家开设1000个法语教学基地,并计划在未来5年中在90多个国家建立140多个“法兰西学院”。与此同时,德国的“歌德学院”已延伸至世界各地。

伴随着第一世界跨国资本向外扩张的是文化产品的大量输出。在雄厚资本的支持下,强势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谋取文化霸权。人类文明始终是相互交流的,但是,自殖民时代以来,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在交流中形成的不平衡、不平等状态有目共睹。第三世界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长期侵蚀下正在被边缘化,逐渐丧失其文化本土特色。

对抗文化霸权,促进文化交流中的均衡、平等、对称,对提升第三世界各国形象和民族精神、维护世界和谐必不可少。于是,我们看到了

中国计划在世界各地建立500所孔子学院的宏伟蓝图,看到了印度借助泰戈尔这个印度文化的符号性人物,在全世界建立“泰戈尔文化中心”、“泰戈尔国家文化奖”以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举措。

在此背景下,日本“战略公共外交研究会”于2007年10月推出专著《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深入分析评论美、英、德、法、日、中等大国的公共外交。

世界正跨入公共外交时代。在中国崛起、世界进入公共外交新纪元的今天,素有“外交家摇篮”之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于2010年8月26日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这是北外在体制上支持公共外交运作的重大举措。“中心”的建立表明北外在加大培养我国涉外及国际机构高端人才的同时,在对外战略研究、国别研究、国际文化、学术、艺术交流等公共外交领域将积极投入,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北外的独特优势在于:近50个外国语种的语言文学教学和科研实体——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海外汉语、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北京市多语种服务中心、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国际传媒中心、世界语言与文化信息中心、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等机构的运作;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所大学和教育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承办了17所海外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

“中心”成立后出手不凡。

2010年9月11日,“中心”举办了高级别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2010)暨第三届外交官论坛”,多位高端人士出席会议,海内外近40家媒体到会采访,中国网全程直播。10月15日,北外张西平和李雪涛教授



《从这里走向世界》(“北外公共外交文化论丛”第一辑)张中载、吴子桐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

合作研究成果《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考和建言》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成果要报》上登载,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11月1日,北外“公共外交大讲堂”开讲。第一讲“开拓公共外交的重要意义”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北外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赵启正主讲。11月9日,“外交部高级外交官创新实践委员会”一行十人来“中心”调研。12月11日,高级别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北外召开。此外,北外的“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动态数据库”被立为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成为国家社科基金成立以来最大的单独特别委托项目。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等机构也在“中心”成立后相继建立。

大学凭借其雄厚的高端人才资源,成为各国最具实力的非政府民间智库和国际文化、科技交流的桥梁。语言和翻译行为因为发生在每一种文化、思想进入异国文化语境的一瞬间,而成为最有力的文化、科技交流手段。

如果说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百年历史中,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以“引进”为主,那么,在21世纪,我们正在经历“引进来”、“走出去”并举的战略转变。北外将以其语言、文化优势在实践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作出贡献。

跨文化对话中的公共外交

张中载

2011年9月,北京外国语大学迎来了七十华诞。北外风雨兼程的七十年,见证和参与了中华民族放眼世界、融入世界的伟大历史进程。

1944年,周恩来同志在北外的前身——延安外国语学校开学典礼上指出:“新中国要有自己的独立外交,中国人民要站起来,要挺起腰杆来面对世界讲话,讲出一个东方伟大民族的胆识和豪情。外国语学校办学思路不仅要培养军事翻译,而且要培养新中国的外交人才。”北外早在成长之初,就承载和肩负着这一艰巨的使命。

70年来,一代代北外人在“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主题下苦苦求索。北外造就了一大批活跃在全国外语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也为国家培养了李肇星等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其中包括四百多名大使,七百多名参赞,北外因此被誉为共和国“外交官的摇篮”。世界上凡是有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就有北外人的身影。

北外积极发挥自身的外语和学术优势,积极翻译和推介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中国的文化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资源,为中国的文化基因注入异域的新鲜血液,历史地践行了“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光荣使命。以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纳忠等为代表的北外学术大师开启了新中国外语教育和外国文化研究的辉煌一页。

进入21世纪之后,北外大力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在一如既往地“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的同时,努力承担“把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新使命,为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实现文化崛起作出积极的贡献。在此期间,学术大师季羨林先生出任北外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并为北外题词“文化交流、中西西传、张扬和谐、全球共暖”,指出了北外新时期的文化使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促进了中国公众与世界公众的广泛交流,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公共外交新时代。北外乘时代东风,加大公共外交研究力度,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举办公共外交论坛。北外的学者亦努力践行公共外交的使命,在学术和大众媒体上发表“中国与世界”主题的文章,深受学界和读者好评。《中华读书报》是由光明日报社主办、在中国知识分子界享有盛誉的一份报纸。其“国际文化”专刊是中华读书报社和北外外研社合办的学术文化刊物,多年以来围绕“中国与世界”的主题,刊载了一大批卓有见地、意趣盎然的思考,其中就有很多是北外学者的文章。

值此北外七十华诞之际,北外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将北外学者近年来发表于《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的文章集结出版。文集共收入文章63篇,从异域文明引介和中西文化交通两大维度,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以记录北外人践行“沟通中国与世界”使命的心路历程。

风华常存——读《王佐良选集》有感

何如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先生的这一著名论断早已深入人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出二十余部北外学者选集作为校庆七十周年的献礼即是佐证。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纳忠,这些名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他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可被冠之以“先行者”、“开拓者”和“奠基人”的称谓。正如比较文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乐黛云教授所说,那个年代的大师们既对外国文化研究精深,融化无碍,对中国固有文化更有通透之了解,因此他们不但是语言大师,更是沟通中西的文化大师,而王佐良先生正是其中的翘楚。

王佐良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毕业生,师从闻一多、燕卜苏、钱锺书,与穆旦、李赋宁、许国璋同门,和那个年代的诸多大家一样,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无论在中西比较文学的探索与拓展、英语文学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还是在自我创作上,他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成为我国著名的英语语言文学专家、教育家、翻译家和诗人。从《王佐良选集》收录的文章中,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不

同领域的学术造诣,并从这些文字中得见一位学者“荒野野老,素心学问”的风范。

作为学者,王佐良先生在中国的英语教育事业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西方思想文化的评介、英语文学研究及英国文学史的史论与撰写等方面,他都代表了当时国内最高水平,学术造诣蜚声国际,并对后继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虽然是西方语言文化的专家,但中国文化造诣也极为深厚,因此更能够抱定立场,以超越的态度通观中西文化。他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的序言《一种尝试的开始》中写道:

中国文学史家既不迫随西方时尚,也不抱残守缺,而是注意收集信息,不放过任何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发展,但又用我们的观点加以审视。比较而言,我们倒是能有英美学者往往缺乏的全面观——西方中心论就遮住了他们的眼睛。我们则力求把英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总图景里来看……

可见在研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他一直以超越的视野心念中国问题,在外国文学史的写作中思索着中国特色。除了框架、思想与内容,甚至在写法上也他强调“要有点文学格调,

要注意文字写得清楚,简洁,少些套话术语,不把文学史写成政论文或哲理文,而要有文学散文格调”。他举例说:“所有中国文学史家,从刘勰到钱锺书,都在写法上为我们示范了。他们写法各有特点,但有两点相同:一是简练;二有文采。他们所写的文学史本身都是绝好的文学作品。”好的文学史要脉络清晰、文字紧凑、大事无遗漏已经难能可贵,不枯燥甚至有文采则是更高挑战,而王先生是认真地把这个原则贯穿于他为学为文的始终。他的文章,无论是严谨的研究著述、翻译作品,还是散文随笔,都用笔独到,深具格调。

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的《彭斯诗选》、《雷雨》(英译本)等作品广受赞誉,他翻译的培根《论学习》,语言精炼、优美、传神,被誉为最权威的版本,广为流传。在《选集》收录的《严复的用心》一文中,我们可以一瞥他的翻译思想:

严复的“雅”是同他的第一亦即最重要的一点——“信”——紧密相连的。换言之,雅不是美化,不是把一篇原来不典雅的文章译得很典雅,而是指一种努力,要传达一种比词、句的简单的含义更高更精微的东西:原作者的心智特点,原作的精神光泽……

而严复之所以选择“以汉以前字、句法”,也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这些人足以左右大局,然而却保守成性,对外来事物有深刻的疑惧;只是在多次败于外夷之手以后,才勉强看向西方,但无非是寻求一种足以立刻解决中国的某些实际困难的速效方法而已。严复比他们看得远;他知道事涉根本,必须彻底改革中国社会,而要改革奏效又必须引进一整套新的思想。……但他又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

由此他得出结论:“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这一创见无疑也体现在他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他的优美译作也正是这一翻译理论的绝佳注脚。

作为教育家,王佐良先生的成就可以从他弟子们的身上得到验证,张中载教授在《秋天,想起了王佐良》一文中写道:“四十多年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时,最爱听王先生讲课。培根的随笔,英诗和莎剧……他让我们爱



《王佐良选集》(北京外国语大学70周年校庆学术成果系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定价:79.90元

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赫胥黎的《论舒适》等等文章提供给我们……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而且他总是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地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总是那样平平常常、一声不响的。

燕卜苏的言传身教塑造了王佐良的教育理念与态度:“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工作里遇到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

作为诗人,王佐良一定更能理解他翻译过其著作的那些西方诗人,他的创作、翻译和研究都隐含着一个诗人的敏锐与感受力。在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一书撰写的《济慈》一文中,他评价济慈所写的《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说:“崇拜希腊古文明的人多的是,却要轮到这没有受过古典教育的医学生来给这种崇拜心情以最动人的表现!也许,这正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学院人士,不是用做学问的方式来看待古文明,而是用了一个诗人的全部活力和全部敏感,因此才写得那样新鲜。”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投射和写照?

在怀念穆旦的文章中,王佐良写道:“良铮过早地走了,但我们还在读着穆旦的诗。”诚哉斯言,一颗诗心,万古文章,正是王佐良和他那一辈人留下的不灭风华。



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致开幕辞

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是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被称为应用语言学界的“奥运会”。日前,来自世界63个国家和地区的1480位应用语言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草长莺飞的美丽校园里分享着应用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中国于2005年成功申办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经过六年的精心

筹备,中国向世界呈现了一届别开生面的世界应用语言学盛会。本届大会由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主办,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承办。大会的主题为“多样中的和谐:语言、文化、社会”——“和而不同”、“和谐发展”折射了中国哲学内涵,同时也是全球化趋势下社会、文化、语言

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为期五天的议程里,各国应用语言学专家和研究人员围绕大会主题和各个分议题充分展开交流。大会设有主旨发言、特邀专题研讨、专题研讨、研究兴趣团队研讨、工作坊、论文宣读和论文展示等多种形式,内容充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国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Barbara Seidlhofer 教授、英国阿斯顿大学 Malcolm Coulthard 教授、新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 Allan Bell 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 Diane Larsen-Freeman 教授分别做了大会主旨发言;大会特别邀请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Patricia Duff 教授、北京大学高一虹教授、荷兰格罗宁根大学 Marjolijn

Verspoor 教授和 Kees de Bot 教授等著名学者主持了8场特邀研讨。在各个分会场,大会期间共进行了61场不同议题的专题研讨,9场研究兴趣团队研讨,7场工作坊,宣读论文769篇,展示论文56篇。与会专家学者就共同关注的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就应用语言学发展趋势、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就语言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促进文化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对世界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和谐发展、学术繁荣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本次大会是国际应用语言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国际学术盛会,同时也是一次汇聚智慧、交流思想、

结识朋友的盛会。希望通过此次大会,我们能为促进世界各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加强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有效的工作平台,加强我国学者与国际同行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交流、理解与合作,分享科研成果,共谋发展。我相信本届大会也将有助于与会的各国朋友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有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并对促进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教育部刘利民副部长在开幕辞中这样说。

除会议期间的发言与交流之外,欢迎酒会、大会联欢、澳大利亚之夜等特色活动也为各国嘉宾提供了结交朋友、增进了解的机会,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参会专家都对大会组织者有条不紊的高效率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组织者从基础设施、学术支持、筹备组织、和人员服务等方面的大量投入,为参会专家学者专注学术研讨、享受北京之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大会周密的安排、个性化的服务和富有创意的细节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

伴随着世界应用语言学这场盛会的落幕,“和而不同”、“和谐发展”的理念将传递到世界各地。本届大会对于提高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加强我国应用语言学家和国际同行的学术交流、推动我国应用语言学和外语教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16届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日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这是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首次来到中国,大会的成功召开,对于推进世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加强中外语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推动中国应用语言学走向世界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应用语言学界的“奥运会”在京落幕